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
——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

郭曰方*　林　君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　北京　100864）

关键词　邓小平，中国科学院，纪念

深受科学界和全国人民崇敬、爱戴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是，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对中国科学院的巨大支持，将永远激励我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不仅时刻注视着世界风云变幻，日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操劳，而且极为重视科技工作。无论是在建国初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年代，他对科学技术事业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

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学技术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和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基地。这里荟萃着众多的科技精英，也是小平同志关怀最多、支持最大的科研团体之一。早在 50 年代初，他就对诞生不久的科学院给予关心和支持。70 年代中期以后，他更是站在战略家的高度，以极大的热情亲自关心和过问科学院的工作。回顾科学院从 1975 年向中央提出“汇报提纲”，粉碎“四人帮”后的恢复和发展，一直到他去世前的 20 多年时间里，每一步前进，都凝聚着小平同志的关怀和心血。

1　治理整顿，拨乱反正

早在 1952 年 9 月 12 日，小平同志在政务院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会议上就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为此，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拨出大量资金，给中国科学院以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持，为我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大批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我国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新中国建立和培养起来的科技队伍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科研工

---

*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副书记，院机关党委书记
收稿日期：1998 年 2 月 6 日

作被迫停顿。在这场浩劫中，中国科学院作为重灾区，更是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1975年，小平同志受周总理委托，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针对“四人帮”对科技事业的破坏，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整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中国科学院。

当年 7 月中旬，党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进驻中国科学院，此后又派王屏和刘华清同志参加整顿工作。小平同志说，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他还具体指示胡耀邦等同志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胡耀邦等同志在科学院各单位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六易其稿，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是由小平同志亲自布置撰写并修改定稿的，甚至连篇幅多长、加什么附件，他都是亲自过问。

9 月 26 日，邓小平主持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在胡耀邦等同志介绍《汇报提纲》内容和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时，小平同志多次插话，指示要让科技人员多一些时间搞业务；要办一些杂志，提高业务水平；要懂外语，了解国外的科技水平；要让懂业务的人发挥作用，不能学非所用；要重视培养年轻人；要解决科技人员后顾之忧等。小平同志对这个《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门也能起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在指导全党拨乱反正中，一直把重新审视科技政策和大力发展科技事业作为他首先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及时召开全国科技教育座谈会，广泛听取科技、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小平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重要讲话，并当场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使与会的科技、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

科教座谈会结束后，中国科学院立即在教育工作方面作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在 1977 年 9 月 5 日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工作问题的报告》，提出要把科技大学办成一所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对入学新生要严格考核、择优录取等当时尚未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二是同年 9 月 10 日向国务院呈送《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对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待遇等方面都作了规定。这两个报告立即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在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小平同志还表扬中国科技大学办得好，特别是赞许创办本科少年班。

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工作的指针，宣告了科学春天的到来。

2　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支持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发展

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致力于推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改革。1981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89 名学部委员联名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拨专款设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基金，以加强国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稳定支持，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发挥学部对全国科研方向的指导、协调作用，改革条块分割

的科学体制。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批准，决定从1982年起由国家财政拨款，设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开创了我国科学基金制的先河。设立中科院科学基金的成功实践，从舆论、经验、干部、起动经费、规章制度等方面，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诞生作了准备，并促进了一些行业科技基金和地方科技基金的设立，对我国基础性研究引入竞争机制及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5年3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面向社会，接受多方面申请，组织同行评议，择优支持。"针对当时有些人对实行科学基金制的疑虑，小平同志1985年7月26日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家都会赞成，不会反对。应该这样办。这是个新事物，办起来再说，取得经验。"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部门设立的行业科技基金，省、区、市设立的地方科技基金，科研、教学单位设立的科技基金，以及民间集资、捐赠设立的科技基金，也纷纷涌现，科学基金制已成为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来源的主渠道。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四位学部委员联名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为了抢占世界高科技的制高点，应尽快制订发展我国高技术的计划。小平同志迅速给予指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据此，国家科委等有关部门组织大批科技专家，制定了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863"计划实施10年，国家财政拨款100多亿元，吸引了数万人参加，出了很多高水平的成果，并且培养和造就了数万名中青年科学家。在当时国家财政并不宽裕的条件下，作出这样的决策并不容易。但是，小平同志站在战略家的高度，以对科学技术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国家发展的远见卓识，看到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技术。没有高技术，我们就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没有高技术，就没有安定和平的环境。后来，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他的这些决策和指示，对我国的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小平同志还亲自关怀和推动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工作。1980年底到1981年初春，李政道教授和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所长潘诺夫斯基教授以及中科院高能所在美的一批访问学者，都提出在中国建造2.22亿电子伏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1981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向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报告，请求批准在北京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小平同志当即批示：这项工程进展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12月2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李政道教授前再次指示：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到工程进度和经费时，小平同志指示：按五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1984年10月7日，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他亲临建设工地，为实验室奠基题写基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并掀了第一铲土。1988年10月24日，实验室建成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亲临现场视察。在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汇报并参观了对撞机后，小平同志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它一些重大

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会越来越大。”在他的指示精神鼓舞下，广大科研人员积极努力，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在世界同一能区实验室中处于领先水平，为我们民族争了光。

与位于北京西郊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相呼应，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面站座落在北京的西北角。从 60 年代开始，随着空间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科学实验活动由地面扩展到空间，利用科学卫星对地球及环境、日地空间和星际空间等进行观测和多学科研究，成为各国竞争的热点。为此，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出报告，要求研制科学卫星。1977 年 10 月 30 日，方毅同志将报告呈交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就明确批示：同意。1979 年 1 月，小平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随同访问的方毅同志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就有关“空间技术合作谅解”进行换文确认。1982 年 12 月 7 日，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方引进卫星地面站的合同。1986 年 12 月 26 日，小平同志为建成的地面站亲自题写站名“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空间遥感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十余年来，它在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科技队伍建设

邓小平历来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96 页)他倡导在党内应营造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8 页)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他经常以长者的爱心关怀科学家，以一个知心朋友的热忱帮助科学家，成为广大科学家的良师益友。

小平同志始终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从科技和教育入手。为了给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讲到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根据他的批示，“文革”中被下放到地方的一批重点研究所重新收回科学院管理，被占用的科大校舍和研究所的所址，陆续归还科学院使用。

我国的水声学，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创立的。解放初国家就专门抽调了 100 名大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文革前，我国水声科研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名望，突出的科研成绩还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然而，“四人帮”硬是把这支高水平的水声科研队伍肢解了，有的科技骨干甚至被调去搞测量海水的温度、盐度、深度这样一些普通的工作，放弃了水下雷达等一大批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有极高价值的科技前沿探索工作。1977 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中科院学部委员汪德昭写信给他，要求恢复国防水声学。小平同志十分认真地看了这封信，当即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处理。几经周折，这支水声学队伍才重新回到中科院，使国防水声学科研工作得到新生。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迁址重建，也是在小平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实现的。当时“四人帮”刚被粉碎不久，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科院筹划在半导体所理化分析中心原址重建新的理化分析中心。小平同志得知此事后，从国际半导体高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及国家半导体事业发

展战略高度出发，高屋见瓴地指出，要考虑学科发展的需要，重建一个新的半导体所。他亲自帮助选址，并从唐山调来基建工程兵参建。实践证明，迁建对半导体所圆满完成国家“六五”课题，争取“七五”和“八五”科研任务，提供了极为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小平同志非常关心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他对陈景润的多次关心和帮助，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早在1975年讨论《汇报提纲》时，小平同志就谈到，科技人员搞科技，“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页)这些话当时对科技人员的鼓舞，提高全社会对科技的认识，所起作用是不可估量的。1977年他又一次谈到，有一百个陈景润有什么不好？他对国家有贡献，对无产阶级作了好事。陈景润结婚后，多年两地分居，生活得不到照顾，住房很困难，科研工作条件也不好。这些问题都是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得到解决。

小平同志对黄昆的关怀是又一个突出例子。他说，“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做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页)同样是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著名科学家如汪德昭、吴仲华、谈镐生、杨乐、唐孝威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平同志不仅关心著名的科学家，对普通科技人员也倾注了巨大的爱心。1978年1月17日，中国科学院领导给邓小平写信，要求主管部门帮助科学院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困难和400户两地分居问题。此信立即得到小平同志的批示，中科院盖了一批宿舍，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

小平同志经常说：“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中的政治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页)1979年9月9日，方毅同志向小平同志反映，科学院需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设备、仪器、元器件、特殊材料等，但国家外汇紧张，历年能分配给科学院的很少，为此建议把科学院各所几年的外汇收入，全部留下作为补充仪器设备用。小平同志9月13日批示：科研所需要的外汇，国家既无力支付，他们自己能够想些办法，我认为应全力支持。

小平同志尤其重视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他提出，要打破常规，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1980年，中科院在中断了多年之后增补了一批新的学部委员。1981年5月，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小平同志和彭真、邓颖超、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席了开幕式，并会见了大会主席团。当院领导胡克实汇报到增补后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有了较大的降低时，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关注地问：有没有50岁以下的？回答有十几位。小平同志又进一步问：有没有40岁以下的？当时只有杨乐41岁。小平多次说过：“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指选拔年轻人)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帐，否则是交不了帐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5页)“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5页)

“在科学研究上，也往往是青年人超过老年人，我们的老同志应当高兴地帮助青年赶上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6 页）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制定了一系列培养跨世纪人才的计划和措施，他们必将在新的世纪里，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4　扩大对外开放，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32 页）遵照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我国先后从各工业发达国家引进了数千项先进技术和大批专业人才，同时还派出大批青年到发达国家进修学习，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提高了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起点。与此同时，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同世界科技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科学家们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心有余悸。1980 年 5 月，第一次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有 500 多名国内外专家与会，其中外国专家 200 多名，瑞典的甘塞尔教授、美国的瑞普雷教授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探险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5 月 31 日晚，小平同志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闭幕式。当他听到外国专家对中国学者在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探险、登山等成果给予很高评价时兴奋不已，当即决定和大家一起共进晚餐。交谈中，有同志汇报说法国科学家提出去西藏考察想带些岩石标本回去研究。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的山那么多，那么大，打一两块石头，大山还在嘛！小平同志的接见和谈话，增强了中国科学院走改革开放之路的意识和勇气。从那时起，青藏高原研究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今天，中国的青藏高原研究能在世界上占有不可缺少的一席之地，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与小平同志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大会结束后不久，一支有中外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在入藏途经日喀则时，遇到了山崩和泥石流，科学家们进退不得，被困了近一周的时间。小平同志知道后，立即决定派飞机救援。

目前，中国科学院与国际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地区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学、公司、国际组织签署了 70 余个院级协议，700 余个所级协议。有 200 多名科学家在各类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聘请了 140 余位外籍专家、学者担任院、所级名誉、客座学者及各种职务。每年进出交流人员 6 000 多人次，举办了几十个国际学术会议，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

邓小平同志不仅亲自领导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邓小平科技思想，它是新时期我们搞好科技工作的指南，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锐利武器。我们中科院全体科技人员和全院职工，将进一步努力学习邓小平科技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努力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